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一卷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尹凤阁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一卷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ZHONGGUO ZIBENZHUYI DE MENGYA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5印张 584,000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300

书号 4001·505 定价 5.65元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

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提起这部书，首先使人深深地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那是在1960年春，我参加了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召开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但同时，也讨论到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二月末，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提出应该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他说：“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几乎都是以欧美特别是以英国的材料作为根据的，看不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现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完成，我们有条件对它作一个历史的总结。这本书如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对中国青年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周恩来同志的提示，实际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心愿。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

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1960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中又说：“很需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据我所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人长野朗曾写过一本；而中国人却还没有写过，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那时候，我在负责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作；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工作，正是工商局的主要业务。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承孙冶方同志的热心支持，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冶方同志当时是所长）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组织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室”，人员都是工商局的，编在经济所。我从广东回来后，就把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这个研究室。现在参加本书工作的吴承明、方卓、方行、胡铁文、汪士信、黄如桐、王水、石奇、简锐、郭太炎诸同志都是当时工商局的成员；只有吴太昌同志是1980年参加的。

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整理资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应有的记载。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迟迟没有人入手的原因之一。为此，在1958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拟定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工作五年规划（草案）》，它首先就是一个收集、整理资本主义行业、企业历史资料的规划。同时，经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发文给有关单位，要求有关党委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随即在十来个资本主义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科研单位为主，成立资料班子，吸收工商联和老工商业者参加。其中上海、武汉、广州、重庆、青岛、哈尔滨等地都是比较有成绩的，陆续收集和整理出一批行业、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71页。

企业的史料，其中有八部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我想重复一句，在这个工作中，许多老工商业者提供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解，有的还搬出多年老账册和文契，他们是有贡献的。现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下，还有十部工商行业史料正在进行整理和编写。

这时候，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不少地方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也在组织力量整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并陆续出版了一些史料书。其中有的是经过专家鉴定的文献资料，有的是经过广泛调查的资料。没有这些可贵的资料，本书的编写，是不可能的。

十年动乱中，这些工作都停止了。这本原应在十多年前就和读者见面的书，也难逃这一劫运！

当时，我丧失了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研究室的同志都进了干校，也都丧失了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的条件。但是，林彪、“四人帮”的这种残酷折磨，并没有使我们的脑子停止思考。我在牛棚里，重新学习《资本论》，写下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后来以《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研究室的同志也没有停止思考，他们在干校努力（有时是偷着）学习，积累材料，研究问题。我还应提出，这时候史学界有些同志，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利用研究《红楼梦》时代背景或打着“批儒评法”招牌，进行了大量史料工作，尤其是发掘了一批档案、碑刻材料和民间文书材料，对本书的编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由衷地感谢这些同志们可歌可泣的劳动。

1973年夏，我获得自由；翌年，原工商局的几位同志也恢复工作。我们立即把撰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任务重新挑起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开始不久。在我们的小型追悼会上，大家含着热泪，表示要以完成周总理交办的这一任务，

来纪念这位无私无畏的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一生的巨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邓颖超同志曾在电话中询问我家情况时，也问及这部书的问题，给我们以热情的鼓励。

原来，在整理资料的同时，我们就派出调查组，调查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于1965年写出一个初稿，包括有关资本来源、雇佣劳动制度、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和分配等方面。恢复工作后，我们首先就捡起这部旧稿，重新调查研究，完成了《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书，于197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项准备工作，也是它的一个副产品。这本书是注重在理论方面的，把它先行出版，用来听取读者和理论界对我们观点的批评和反应。接着，我们改写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该书原有1962年的一个版本），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则是我们心目中把它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最后一卷的内容的，先行出版，也是为了求得读者的意见。

这时候，我已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本书原来的工作班子也于1978年转入经济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就成为经济所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进入编写阶段，这却不是我们几个人所能胜任的。我们展开了协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黄逸峰、蔡北华、孙怀仁等同志，和南开大学滕维藻、谷书堂等同志的赞助和热情支持。决定由上海、天津和我们三方面共同完成周恩来同志这个遗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蒋立、徐新吾、唐传泗、陈正炎、徐雪筠、汝仁、黄婉兰七位同志参加编写。南开经济研究所丁世洵、刘佛丁、朱秀琴、丁长清四位同志参加编写。他们很多是多年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并编辑过大量经济史资料。他们主要是担任本书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部分章节。

南开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丁世洵同志，不幸于1981年因病去世，竟看不到本书的出版！我们对于这位认真负责、谨严纯朴的学者，表示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按照规划，本书分为四卷：第一卷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写到1840年为止。第二卷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断代自1840年到1919年。第三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断代自1920年到1949年。第四卷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下限写到1956年。这是按照中国近代史的一般分期办法，对于写经济史来说并不十分合适。不过，此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分期标准；因此，我们打算在各卷的衔接上不拘泥于时限，使每卷仍能独立成书，事实上，它们也不能同时出版的。

在上述三方面的协作下，本书前三卷是同时展开编写工作的。不过，我们还是按顺序集中力量。现在出版的仅是第一卷；第二、第三卷准备在今后两三年内陆续完成。第四卷，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本子问世，打算再经修订，最后出版。

以上就是本书的编写经过。

二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历史书，它的要求，自然是如实地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它应是一个“历史的总结”。我们认为这种总结应有它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而这也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应有的目的。

资本主义，仅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经济成分，而且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但是，它对于鸦片战争后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有着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个

问题时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①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断发展，决定着中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显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没有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以来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革命也就不会是那样的曲折，甚至也不一定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即解放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是这样。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化大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同时，如果中国原来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又将是另一种道路、另一种方式了。

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② 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发展状况如何，对于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却极为重要。不用说，那些企图走欧美工业化老路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以及抗日战争后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民主论者，曾经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幻想式的估计；即在号称“左派”的革命者中，也曾用臆断代替考察，来评价中国的资本主义，以至陷入反革命营垒去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曾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稍后，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又有一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两场论战都是由当时占有一定势力的中国托洛茨基分子挑起的，而他们的论点都集中在这样一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评价上，即：中国资本主义同侵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因而，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40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6页。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农村也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取消了土地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批判了这些谬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得以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经历了长期的武装斗争，经过了曲折的道路。在长期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也犯过各种错误，招致失败和损失。而其中几次重大的错误，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后来多次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都是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分不开的，并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毛泽东同志说：“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显然，要想正确对待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都只有确切掌握它们发展的状况，才能提出正确决策并顺利实行。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伟大胜利曾使世界人士惊异，而要探讨这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的赎买等一系列政策，也都需要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明晰的观点和分析。

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消灭了，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正象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一样，社会主义也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绝缘的。事实上，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在不少问题上，都是和对中国资本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68页。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分不开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正是造成“左”倾路线的诸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一部比较详实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于总结中国革命、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经济毕竟是基础，对经济状况认识得愈清楚，社会和上层建筑问题也就愈能得到说明。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所应有的政治目的。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这本书如写得好，“对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帮助”，这就是本书的理论意义。我以为，编写本书的另一目的，就是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准备材料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是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的。不过，恩格斯说：“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②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从更广泛的历史上，研究人类社会相继发生的各种经济形态。广义政治经济学至少要包括三个研究领域，即前资本主义部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部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部分。至于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国家”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虽然不是一种单独的社会经济形态，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仍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种经济中，生活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189页。

② 同上书，第190页。

最大多数的人民，以至这种不发达本身就形成一个“世界”。在这种经济中，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常会有一些条件使它们能较早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这种经济的研究，必然会大大丰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三个领域；上述三个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缺少这一部分的研究，也将会是不完整的。

政治经济学是用科学抽象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一般的规律。但是，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从丰富多采的众多个别中抽象出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历史科学，是以人类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作为研究基础的。这个基础愈丰富，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愈准确。政治经济学虽是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一般，却不是它的内容是一成不变的。人类的历史，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认识，都是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的。又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民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也必然有其各时代的和各民族的特点。这也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含义。广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要把政治经济学规定成为一个格局，一个公式。毛泽东同志说，要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①，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就是走着这条道路；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应如此。

我在1947—49年执笔而在1950年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毛泽东同志上述指示下的一个尝试。该书把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作为第二卷研究对象的一个部分；那时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71页。

^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1页。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刚在创建中。这部书不仅体系不全,而且有不少错误。现在我正在进行全面改写。广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体系,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象近代中国这样的有一百年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应该做专门的理论研究,则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种经济成分,它发展微弱,历史也不长。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它的原始积累、资本积累、以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诸过程;同样看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这些过程和规律的作用,又都具有中国的或者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并且,从所有制(帝国主义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到生产、流通、分配,都有它的中国特殊内容。这是不可能从已有的经济学说,或者别国的经验中得到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首先就是提供这种经济实际,为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准备理论研究的基础。周恩来同志在广东从化交办这一任务时指出:“要写出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如果没有完整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著作,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并不长,毋宁说是短命的。这种情况,正反映了它的一个特点。本书是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的。在第一卷中,所考察的实际是从明代到清代的封建社会,是从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中,来发掘那些微弱的、发展十分缓慢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本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作结束的。这种改造,在世界史上具有首创性。而那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本书的第四卷,又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史、属于过渡时期经济史的范畴的。因此,本书又是在所讨论的学科范围内,为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封建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服务,

为这两部分的理论研究提供某些内容。人的正确认识来自社会实践，科学的抽象也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并且，人们的抽象力也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历史不长，但它从头至尾，是经过中国革命（从鸦片战争算起）的实践检验过的。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建立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算起，都是经历过或看到过它至少一半的实践过程的。从一方面说，这是今天编写本书的良好条件；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鞭策我们，要尽可能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实际知识，贡献给读者，贡献给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

对于任何经济现象，以至所有经济现象，只有从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去考察，才会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的一致性，正在于此。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并不发达，它却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全过程。本书的体制也正是从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进行考察的。这一方面说明本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同样是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概括起来，就是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要给它作一个“历史的总结”。

三

关于本书内容的设计，我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一、基础和上层建筑

一部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应当是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最初曾打算这样写的。我从四十年代初期起，就同资本家打交道，后来长期从事

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颇为熟悉。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同志，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处理阶级关系问题，也积累有不少的经验。但是，当我们试图把政治和经济写在一起时，却感到十分困难。这在一篇论文中比较好办，作为一部篇幅较大的书，则除非各自独立成卷，是很难构成体系的；而各自独立成卷，又分别是政治史和经济史了。意识形态更是一个专门领域，涉及文化的许多方面，我们也感到力所未逮。这里，我们体会到学术研究分科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①而所谓“综合的研究”，恐怕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抽象，找出相互关系和共同规律，而不是把各种史编辑在一起。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它写成一部经济史。

但是，并不是说就不去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一部经济史，本书还是比较重视写资产阶级以至他们的思想的。但不是作为政治史和思想史来写，而是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重点地来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没法不同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发生关系。马克思多次指出：商品、资本本来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的关系。从司马迁起，写人物就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近代史学，尤其是经济史，似乎丢掉了这个优良传统；一个时期，甚至讳言人物，以免遭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之祸。我们打算改变一下风气。当然，我们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②。限于篇幅，只能是某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又只能是少数几个经济范畴的代表人物。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76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12页。

第二，我们把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活动和他们的经济思想，作为一个重点。这倒不仅因为他们是第一代，而是借此分析中国近代产业的资本来源，说明我国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历程。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产业的发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进行的，他们政治活动的缺点也正是产业资本的弱点。这时期产业资本的发展，代表一定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以后的历史，就不是这样了。

第三，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我们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作横断面的剖视，包括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关系，暴力统治，工人阶级贫困化等。资本家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剥削，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本身、罢工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则除作背景提到外，不能多说；因为一讲下去，便成中国革命史了。

第四，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无论是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或是对民族资本的改造，都是一场严重的、尽管是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而其中又包括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以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与合作。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本书的重点。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五十年代，在关于经济史研究的对象的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不包括生产力。或者说，经济史是“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而生产力只是一种条件。这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某些学者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并不仅是一种“条件”。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

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了。

不讲生产力，经济史就变成抽象的历史，变成社会发展史。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些学者就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或者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论证，往往缺乏说服力。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史，也是要研究生产力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就是最好的范例。例如，我们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史。“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②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也离不开生产力。《资本论》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就作了大量生产力的分析。今天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对此感触尤深。因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在处理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一些失误，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就常是由于忽视了生产力的实况所致。

西方经济史学者一般是重视生产力的，甚至专以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有人说，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其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 Ralph W. Hidy）近年来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成长理论，也都是研究生产力的。他们注意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用计量方法研究各时期的生产效率，这是可取的。然而，他们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是掩盖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永久存在的前提，忽视生产关系的变化，在历史问题上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西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10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204页。

者，常常按照资本主义社会来处理中国近代经济，以至把封建地租看成利润，把我国的小农经营说成是“家庭资本主义”等等；更不用说他们否定帝国主义侵略，否定殖民地经济的一面了。

我们认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反映这两者的适合或不适合，就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

我们在本书中，是比较重视生产力的论述的，这也是因为前一时期的经济史著作太不注意这一方面了。当然，困难是很大的，主要是缺乏资料，尤其是技术资料 and 统计资料，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我们在研究中，希望尽可能地对于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提供一些具体内容，并对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作出某些估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限制下，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这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殖民地性和生产关系上许多特殊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生产力的研究上，可以解释生产关系上许多消极的特征。这种生产关系，又反过来障碍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生产力变化对于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很微弱，作为历史借鉴，仍是重要的。例如，我们发现，在明清两代，凡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原来它们的生产力都有一定的发展，乃至技术上有相当的改进，起码是工艺学上的改进。经过较大量的考察，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中，同样存在着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现象。尤其是工场手工业这一形式，在二十世纪初有迅速的发展，并有不少重要行业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过渡；只是没有象西欧那样，有一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我们还发现，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中，有些行业，通过技术改革，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情况，同样是存在的，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甚至可达到外商工厂水平；只是限于少数企业，范围甚狭而已。